

烟台牟氏：官商学600年浮沉



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 联合报道

牟氏庄园虽大，却仍难以找到牟家的精神缩影。

绵延20代，烟台牟氏因科举而兴，有明一代，他们从异乡人成长为胶东的仕宦望族；至清，宦海浮沉，牟家退而隔岸观火，以耕读传家，攒下巨额财富，终成罕有的商业世家；再至民国，牟家再无经世致用之学，转而探寻精神世界，出一大儒牟宗三，为学人典范。

600年间，这个大家族历经变革，是随时准备“相机而动”的先行者，审时度势，因势利导，是其独有的生存之道。而在变动中唯其不变的，是家族的延续。



烟台栖霞牟家疃村至今还保留着淳朴的乡村生态。本报记者 刘志浩 摄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

53岁的牟家疃村果农牟红成说，当年与“大哲学家”爷爷牟宗三见面时，最令他难忘的，是抛出那个自以为“很尖锐严肃”的问题时，换来的却是一句“轻描淡写”的回答。

“我问他，如果我们不来找你，你会不会找家里？他提了提腰带，转过身哈哈一笑：‘我以为你们早死了！’”

这次牟氏家族第21代和第19代人的对话，发生于“文革”结束后的1984年，香港。

11年后，86岁的牟宗三在台湾去世——离开家乡58年，他终究未能还“家”。至今，牟红成失望之情难掩，“他光顾自己，不考虑家庭。”

在这个村子，没文化是种耻辱

从烟台出市区后向西南方向，沿着204国道再转一段省道，穿过蜿蜒的山路，经过大约2个小时，汽车停在一处小镇。

街道两边是整齐的门头房，蓝白相间的卷帘门上多标有“果品”字样，这儿就是栖霞市蛇窝泊镇。按照当地人的指引，从镇政府向东不远，走大约1里的小路，就到了牟家疃村。

600多年前，从湖北公安迁至山东栖霞的牟氏一家，最终选择落脚在这个小村子，从一个被视为“外来户”的柔弱小苗，经世代沐风栉雨，成就了牟氏“世家大族”的美名。

历经明、清、民国至新中国数百年风云际会，如今拥有1000多人的牟家疃，牟氏族人依然占了大约80%。

牟氏七世牟时俊为振兴家族，曾定下“读书取士”的祖训，从那时候起，重视家族子弟教育的习惯，便被保留了下来。

“以前我们牟家一直都有私塾，后来有了小学，也几乎没有断过。”牟氏十九代传人牟芳亭声音浑厚。

77岁的牟芳亭上世纪50年代从本村完小毕业，至今保持着读书的习惯。2月19日，在牟芳亭家炕边窗台上，整齐摆放着十几本书，其中还有一本厚厚的新华字典。

“闲着没事的时候，就喜欢翻翻书，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就查字典。”牟芳亭笑着说，如果当时有机会，他希望自己还能接着“往上上”。

来过牟家疃村十数次的鲁东大学副教授侯风云2010年曾对该村70岁以上老人进行过统计，发现他们中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占到近60%，而在50-70岁年龄段中，只有5人不识字，1960年以后出生的村民中，只有1人不识字。

“村民识字率这么高，在一般村里是难以想象的。”2月18日，侯风云向齐鲁晚报记者说。

不止一位牟家疃村民向记者表示，“会不惜一切代价，供自家孩子上学。”

“在这个村子里，没有文化就是一种耻辱。”端坐于炕头的牟芳亭，翻着厚厚的《牟氏族谱》，重重吐出这几个字。

邻居天天唱戏，也没能阻止读书

牟芳亭识字有限，但谙熟家族历史。

《牟氏族谱》记载，明朝洪武三年（公元1370），湖北公安人牟敬祖来栖霞任主簿（主管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，系低级之事务官，本报记者注）。卸任后落籍栖霞南榆疃，是为湖北公安籍栖霞牟氏第一人。而后，四世牟庆时迁至牟家疃（当时名为“杨刘村”），牟家疃遂成栖霞牟氏发祥地。

如何保住生计，成为当时牟家的第一要务。一世敬祖虽曾为主簿，但清廉守规，并没有多少财产。而他去世前的一场大病，更是把仅有的一点家底掏空。

作为“外来户”的牟家，并无其他门路，糊口尚难，更遑论读书识字。于是，从二世传到七世，家境非但没有起色，反而每况愈下，最终沦为本村大地主家的佃户，遭人歧视。

直到七世牟时俊时期，牟家才迎来崛起的转机。

“老八支是我们牟家一个辉煌的开始。”牟芳亭说这话时，拿烟杆的手有些微微发抖。

所谓“老八支”，即牟时俊的8个儿子。虽然那时“多子”意味着“多福”，但这么多人光口粮就是大问题。

于是，牟时俊做了足以影响家族走向的决定：集全家之力，供养儿孙们读书科举，这成为牟氏后人最引以为豪的家训之一：“读书取士”。

当时已是明朝中晚期，科举之路并不平坦。其间，还有一个小插曲，据牟芳亭讲，当时，牟家曾因一片坟地与同村刘姓地主家结怨。看到牟家子孙众多，似乎预感到威胁，刘家便“乐声伎，沉杯酒”，即找戏班子天天唱戏，宴请宾客，试图妨碍牟家子弟读书，但牟时俊却“延明师，谋诸子”，一再告诫子孙，“邻家日演一部戏，儿曹每课三篇文章。”

最终，牟时俊8子中6子走上仕途，牟家渐成富裕之家。

“没有牟时俊的改变，没有老八支们的刻苦努力，也就没有后来牟家的全面辉煌。”牟芳亭认为。

不拘陈套，顺势而动

不过，随着明清王朝更迭，牟氏家族的崛起戛然而止。

更大的祸患还在后头。顺治九年（1652），栖霞发生于七领导的抗清起义。牟氏九世牟镛因与于七有交往，被清廷追究，他的8

个儿子（即牟氏族人后世所称“小八支”）也受牵连入狱。

出狱后，政治的险恶让牟氏重新考虑读书考功名的祖训。以牟国瓏为代表的“小八支”，仕途并不顺遂。尤其牟国瓏在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时，遭到权贵诬陷，被迫解甲归田，进一步坚定了牟家远离政治的决心。

牟国瓏告诫家族子弟，必须努力读书，但不能将做官视为唯一目的，要潜心农耕，持家立业，过得了安分守己的日子。

“牟氏‘耕读世业’的家风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确定并流传下来的。”同样了解家族历史的牟氏十九代传人牟日宝说。

而这一家风的最大成果，便是造就了后来被称为“中国民间第一大财主”的牟墨林，国内现存最大地主庄园——“牟氏庄园”，便出自他之手。

牟墨林时期的牟氏，在家业上达到了鼎盛。牟日宝说，牟墨林“打破了富不过三代怪圈，实现家业十代连兴”，还“常年无偿放饭救济民众，五代人用粮亿斤以上”，创造了“庄园不用一个家丁，却无一个土匪来抢”的奇迹。

但是，在牟墨林去世（1870）之前，承载牟氏风光的那个古老民族，便以一种无比惨痛的方式，与世界进行了第一次“亲密接触”。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，已经在自己的轨道上安然运行了数千年的中华帝国，在“外夷”面前节节败退。

封闭的圈子被打破，时代变迁再次来临，牟家也在所难免。

几百年来，世代随时代起伏的牟家再次迎来家族变动，而这个家族几百年来形成的不拘陈套、顺势而动的血脉则更多留在了一个人身上，牟氏家族的第十九世牟宗三。

牟宗三的乡愁

作为现代新儒学的旗帜人物，牟宗三无疑属于整个世界。

1909年，牟宗三出生于栖霞牟家疃村。当年祖上为了生计而迁入，但他为了追求更多东西，选择了离开。

1927年，牟宗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，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。得遇著名哲学家熊十力，牟宗三在中国哲学上大放异彩，影响远及海外。

而早在1932年，牟宗三就与原配夫人王秀英结婚。1934年，长子伯璇出生；1937年，次子伯璠出生。据说，1947年，牟宗三任教中央大学时，曾托同乡好友回栖霞把母子三人接到南京，时逢家乡正在土改复查，家人害怕因此牵累，不予应允。

1949年，牟宗三离开大陆去台湾，当时有人劝阻，牟宗三说，地球是圆的，怎么会回不来。

未承想，这一去再没能回来。1958年，牟宗三在台湾与赵惠元女士结婚。而两地相隔，牟宗三也淡出了烟台家人的记忆。其实，在《五十自叙》中，牟

宗三还深情回忆家乡的山山水水，认为那是自己生命中“最敞亮最开放的时节”，这里不但让他对生命有了最初的体悟，还引导他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：“奠一杯酒在坟前，坟中人的子孙们前后有序地排列着在膜拜。那生命不是隔的，通着祖宗，通着神明，也通着天地……”

带着对生命的幽思，牟宗三在哲学这个古老领域越走越远，终成一代大师，也被族人们认定为“牟氏家族自敬祖籍栖霞迄今六百多年来，德业与成就出类拔萃者”。

尽管牟家疃的人们隐约感觉到牟宗三的成功，但却心怀芥蒂，认为当年家里倾全力供养出的这个大学生，至死却没有多少“回报乡里”举动，实属不该，与以家族的光大延续为己任的“先辈名人”相比，算是异数。

“他在外面名声再大，对我们村子、对我们来说，也换不了一所学校、一条路啊！”2月19日，牟家疃村一位牟氏后人说。

而“文革”时，因为牟宗三的关系，身在牟家疃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却少担惊受怕。

“虽然不至于被拉去批斗，但我爸爸（牟宗三长子牟伯璇）和奶奶总有被歧视的感觉，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来。”忆及往事，牟红成叹了口气。

不能给爷爷脸上抹黑

1974年左右，牟宗三的二儿子牟伯璠在村委订阅的一份《参考消息》上，偶然看到一则消息，大意是香港大学一个名为“牟润荪”的教授到内地访问。这让他想起，此前牟宗三的一个学生，曾辗转留话给牟家人老师已经去香港的事。

“我叔叔就写了一封信，内容好像只有一句话：牟宗三是否改名牟润荪？”牟红成回忆。

后来他们才知道，牟润荪和牟宗三是两个人，但巧的是，他们都来自烟台，同在香港大学教书。前者很快将信交给牟宗三。

历经一番波折，身在栖霞的牟家人终于等来了回信：“牟润荪是另一个人，牟宗三永远不改名，还健在。”牟红成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封信的内容念了出来。

彼时，内地和香港解禁邮才一两个月，信件寄发需要层层审批。尽管如此，牟家人依然欣喜不已，并想尽办法与这个“失散”已久的爷爷书信往来。

2月17日，齐鲁晚报记者在栖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林新忠手里，见到了牟宗三写给家里的20多封信，内容涉及一些牟家琐事，还督促子弟“好好学习”。

1984年，牟红成和叔叔牟伯璠终于来到香港，见到了“据说在外面名气已经很大的爷爷”。

至今，牟红成对初次见面的情形历历在目，“我问他，如果我们不来找你，你会不会找家里？他提了提腰带，转过身哈哈一笑：‘我以为你们早死了！’”

在香港住了50多天，牟红成并未如愿留下，因为“爷爷说他没能留在父母身边尽孝，我是男孩子，应该留在家照顾父母。”

“他也知道，如果（‘文革’时）回来，会是什么样的结果。”牟红成说，虽然他理解爷爷的难处，而且自己这一辈的几个兄弟结婚，爷爷都给了几百元的红包，但“总觉得他帮家里少，总不能光顾你自己在外过得好吧？”

牟宗三留给牟红成最大的一笔“遗物”，是他的16本著作。

父亲识字很少，即便高中毕业的牟红成，这些书也“只能留着，看是看不懂了”。

而在给牟伯璠的信中，牟宗三就料到：“我那些书，儿孙无能读者，即保存着也无意义，其实也是保存不住的。将来只有保存于社会，社会上自有纪念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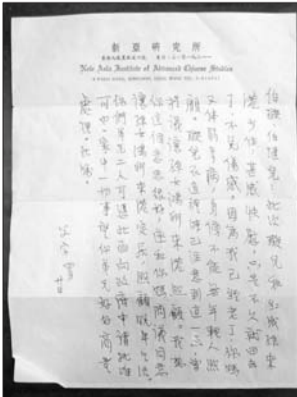
牟红成现在在果品批发市场经营一家苹果商行，牟家后人大部分也都还在村中过活，看起来已与一般村民无异。

虽然没有像爷爷那样做学问，可是爷爷所给予的鼓励和教诲，让牟红成懂得了怎样做人、做事，“无论如何，都不会给爷爷脸上抹黑！”

部分资料据《清代栖霞牟氏家族文化研究》（俞祖华、王海鹏著），《一家一天——牟家疃村的文化变迁研究》（侯风云、徐冰著），《栖霞明公——牟氏望族》（牟日宝、牟珍著），《牟氏庄园三百年》（牟日宝、刘明久著）等，谨向上述作者致谢。



牟宗三。本报记者 李泊静 翻拍



牟宗三写给家里的信。本报记者 李泊静 翻拍